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欲望的伦理表达

## The Ethics in Desires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李长亭 (Li Changting)

**内容摘要：**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描写了康妮与克里福德无性的婚姻状况以及与梅勒斯基于身体欲望的两性关系，试图为欲望找到一个开放的语境。整部小说洋溢着对性放纵和反传统行为的赞美。但本文认为，康妮在家庭、婚姻以及身体欲望的选择上，更多地倾向于自然选择而非伦理选择，全然不顾婚姻中的契约精神，即维护家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是妻子的重要职责这一家庭伦理身份。她一系列的性放纵行为是对夫妻关系和家庭伦理的粗暴践踏，这与其说是彰显“血性意识”，毋宁说是把自己降格为动物的现实表达。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中的家庭和婚姻伦理秩序，使婚姻和家庭沦为空洞的能指符号，其神圣的伦理属性在原始欲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因此，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

**关键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伦理身份；自然选择；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李长亭，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7BWW081】，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美国电子报的中国文化与形象的传播与变异研究”【项目编号：19YJCZH16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thics in Desires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

**Abstract:** Lawrence depicts the Connie's marriages with Clifford void of sex and the absolute sexual relations with Mellors, which attempts to find an open context for the desires. The novel permeates the approvals of sexual indulgence and anti-tradition. However, this paper thinks that Connie, Clifford's wife, on the choice of family, marriage and desire, utterly neglects the contract spirit of marriage, that is, to protect the familial morality and spirits is a wife's important duties, and her indulgence into the sexual activities with other men coarsely violates the ethic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which would rather degrade to the animals without moral consideration than the announcement of "blood consciousness". This absolute egoism severely hampers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order of family and marriage, and causes them to be empty signifiers without any ethics entailed in it under the surge of primal desire. Therefore,

to build the harmonious and steady familial ethical order is the base of healthy society and also the symbol of human beings different from other ones.

**Key word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ethical identity; natural choice; ethical choice

**Author:** Li Changting, Ph.D., is Professor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ct66385@163.com).

##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 以下简称《查》)是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最有名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作品通过一个贵妇人背着丈夫与仆人私通的故事,描述了无性婚姻的破裂和基于欲望的两性关系的发展。在对这部作品的评述中,评论家几乎都聚焦于男女主人公的血性意识和对工业社会扭曲人性的挞伐。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在致英国小说家奥利维亚·莎士比亚(Olivia Shakespeare, 1863-1938)的信中写道:“《查》是一部高尚的作品,其语言有时粗俗,但是全书充溢着火一般的激情,即使是性的部分的描述,也是为了反对一个腰身以下已经死亡的时代”(张中载 123)。“劳伦斯写这部书是他最后做出的努力,企图把爱情作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反实用力量,把做爱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象征。这对已经被工业化社会大大削弱了的个人来说,实在是太抒情化、太自若、太自由了”(张中载 131)。劳伦斯本人也声称,他写作此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做爱是一个人的正当生理要求和权利,应该愉快地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应该被看作是淫荡。<sup>1</sup>

纵观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很少有从家庭中的伦理身份层面对男女行为进行道德剖析的,而家庭问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中心问题,家庭问题中的伦理身份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展开的。<sup>2</sup>“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5)。其实,《查》在张扬性解放这个显性主题外,还并行着一个隐性主题,即如何建构家庭的伦理责任。作品的叙事貌似在为欲望找到一个开放的语境,以颠覆传统的伦理空间和秩序,因为在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的禁锢下,欲望只能得到部分的实现和表达,性只能与生育相关联。其实,在劳伦斯看来,没有人是正常的。当绝对自我屈服于社会无休止的挑战时,

1 参见 D. H. 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奥维德·劳伦斯论性爱》,戴望舒、黑马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308-309页。

2 参见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自恋的自我就不会长时间的独善自身。这就是对劳伦斯而言的相对论。<sup>1</sup> 相对论也表明了他笔下的人物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而言都从来没有绝对和完整的。他曾写道：“天下所有的事情对于个体生物而言都是相对的，个体生物之间也都是相对的”（Lawrence,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182）。家庭是这种相对性表现最集中的地方。在家庭中，个体努力呈现出自我状态，但家庭也是检视欲望形成过程的场所。劳伦斯把他笔下的人物置于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家庭和社区这些社会单元不断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活动。这些人物常常是不囿于血缘关系的羁绊，他们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极力想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劳伦斯既向往又排斥家庭，如果说传统小说习惯于以婚姻和家庭团聚为结局的话，劳伦斯则倾向于以自杀、家庭破裂或犹豫彷徨作为人物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包含着强烈的伦理反思，体现出劳伦斯思想上的双重性。就《查》这部小说而言，我们应看到，小说在张扬个性解放、反对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考虑着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蕴含的伦理价值。

### 家庭结构与伦理身份

康妮的家庭成员中有父母和姐姐四口人，她的父亲麦尔肯·瑞德爵士曾是皇家艺术学会知名人士，而她的母亲则是颇有点拉斐尔前派风格的费边社成员。在艺术家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康妮和她的姐姐希尔达接受了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非传统教育”（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2）<sup>2</sup>。那么，当时的传统尤其是家庭传统又指什么呢？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时代，和谐向上的家庭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核心之一。维多利亚文化就是以这种家庭观念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文化，它要求人们重视神圣的婚姻和美好的家庭，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以家为首的国度，国人对于保护家的温暖是认真和全力以赴的，因为家仍是一切之源，没有了家，大英帝国也不可能荣华”（Williams 66）。在家庭这一社会单元中，家庭结构和成员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家庭伦理秩序的建构，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小说《查》几乎没有提到康妮的母亲，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她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神经病患者”，她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行事方式，在她思想上或心灵中有她无法摆脱的“某些古老的权威印象”，她只想让她的女儿能“自由”和“成就自我”（5）。所以她并没有给康妮造成多大的影响，而且和丈夫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因为他是“光会享受自己生活”（69）的人。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下，康妮的行事风格更多地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1 参见 Lawrence, D. H.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182.

2 本文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引文均来自 D. H.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杨恒达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而她的父亲则是提倡自由的，包括婚姻方面。康妮在德累斯顿主修音乐期间，她就与迈克利斯发生了性关系。在 1913 年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希尔达 20 岁，康妮 18 岁，“她们的父亲已明显地看出来她们已经有过恋爱经历了”（5）。当时的社会传统是不主张女孩子有婚前性行为的，不过父亲并没有对她们的行为提出什么异议。当然这种行为也不是奔着婚姻去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生理需求，虽然后来康妮不时和迈克利斯偷情作乐一番，但这终究不会长久。在与克里福德结婚后，因克里福德的身体原因，康妮无法与他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更无法生育。她的父亲对她说：“康妮，我希望不要让环境迫使你守活寡”（17）。后来，她的父亲又一次提醒她：“康妮，你为什么 not 找个情人呢？也好享尽人间之福”（20）。当康妮父亲和克里福德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克里福德说：“我恐怕守活寡的生活不太适合康妮”（17）。在他得知康妮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时，他告诫康妮：“情感是变动的，你今年可以喜欢这个人，明年喜欢另一个。但拉格比还在，只要拉格比忠于你，你就要忠于拉格比。除此之外，你可以尽情让自己享受。但是如果你要把关系撕破的话，你是得不到多大好处的”（332）。拉格比是克里福德经营的矿区，在这里指代克里福德家族。父亲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康妮在维持婚姻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求。可以说父亲的“教导”是促使康妮婚内出轨，最终走上婚姻破裂道路的始作俑者。

不过这些反传统的行为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不可能公之于众，而合乎传统的行为则是公开进行的。当时英国法律规定，不到 21 岁结婚需要父母的同意，超过这个年龄结婚则拥有较大的自由。<sup>1</sup>也就是说，如果不满 21 岁结婚，首先需要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小说特意提到了几个时间点，比如，1913 年时康妮 18 岁，而她和克里福德则是在 1917 年结婚。也就是说康妮是在 22 岁时结婚的，符合法定结婚年龄。1916 年，赫伯特·查泰莱阵亡，于是克里福德成为继承人，接受了准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这份家产（8）。但 1918 年年初，克里福德却一身伤残地被送回来，孩子不可能有了（10）。小说没有透露康妮嫁给克里福德的原因，但我们从年份上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且克里福德也是在婚后才上战场并负伤的，所以克里福德的瘫痪是婚姻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一切都是在遵循着当时的社会传统和婚姻伦理，因为门当户对，各方面条件相当是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婚姻缔结中最经常的决定因素。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7），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克里福德属于贵族阶层，他父亲是准男爵，母亲是子爵的女儿。从艺术角度来讲，地位不平等的婚配可以制造出很好的故事和戏剧，但是好故事和戏剧却不一定反映社会现实。尽管中产阶级的婚姻有经济上的谨慎性，但是远非是工具性的。他们的婚姻肯定对各方都有利，但绝

1 参见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66 页。

不只是为了利益的婚姻，应该是精明的经济考虑与浪漫的爱情理想并存。康妮和克里福德刚结婚时，除了在性方面差强人意之外，两人表现得还算亲密，康妮甚至对克里福德结婚前的童子之身感到有点欣喜若狂。小说叙述道：“性爱只是偶然的、附带的事，〔……〕并非真正必要的事情”（9）。这虽然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反映了当时康妮的心理特征。在克里福德瘫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康妮仍抱着对克里福德的忠贞，即使有男人对她表示明确的爱意，她也没有动摇过，“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对他们稍微表示一点轻佻，将使可怜的克里福德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所以她从不给他们鼓励”（18）。这体现出康妮当时的伦理选择。她能够恪守当时传统的社会道德，坚守自己身为人妻的伦理身份，凡事都以丈夫的身份地位为要。在克里福德没有失去生育能力之前，康妮内心深处还是想要个孩子的。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康妮想成为真正的母亲，为克里福德家族传宗接代，这体现出她的家庭责任感和对自己伦理身份的考量；二是“这样她就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对抗她的小姑子爱玛”（9）。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她有了查泰莱家族的子嗣，就可以继承家产和爵位了，否则她的小姑子爱玛就有权继承了。康妮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也符合当时社会传统和伦理秩序，表现出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追求。

劳伦斯对康妮这些行为的描写是公开化的，合乎当时的社会传统伦理要求。这既体现了劳伦斯的双重性，也同时为主人公的婚变埋下了伏笔，因为康妮身上隐伏着的“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sup>1</sup>在对自己的伦理身份和行为进行着艰苦的抉择。

相比康妮的家庭，查泰莱家庭结构显得不太完整，父亲乔弗利男爵、哥哥赫伯特·查泰莱和妹妹爱玛四个人，以及家里的管家波尔顿太太，但小说没有提及克里福德的母亲，波尔顿太太某种程度上就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他们相对比较保守，很少与其他人来往。他们尽管有贵族头衔和土地，但由于父亲乔弗利男爵沉思、固执、封闭的天性，甚至与他们自己的阶级也有点疏离。与康妮家成员的选择不同，在一战期间，克里福德的父亲乔弗利男爵全力支持战争，他把自己的树木全部砍掉用来修战壕，把矿上的矿工全部打发到战场上去。另外，他还慷慨解囊，支援战争。“他为国家花的钱比挣的还多”（7）。他甚至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结果一死一伤。更糟糕的是，伤者还失去了生育能力，这表明查泰莱家族失去了繁衍生息的可能。这一切使他自己在懊恼和绝望中死去。可以说，查泰莱一家为保家卫国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但劳伦斯在描述这些时，却运用了调侃的语气。他反复用“可笑”一词来形容这些变故，这充分表明了他当时对战争的立场，同时也对查泰莱一家的付出持否定态度。

1 有关“斯芬克斯因子”的概念定义，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1页。

小说虽然没有提及克里福德的母亲，但在他的生活中，管家波尔顿太太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战场上受伤回到家后，妻子康妮对他的态度日益冷淡，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但在波尔顿太太的影响下，“他逐渐找到了归属感。一种新的自我肯定又回到了他身上”（122）。“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尔顿太太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他的妻子康妮却从未做到过这一点。康妮的冷眼旁观，总是让他很敏感，让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波尔顿太太则让他只意识到外面的世界”（125）。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克里福德由于乱伦禁忌，对母亲的欲望受到压抑，但他从战场上回来后似乎增强了这种欲望。他把这种欲望投射到了波尔顿太太身上。她使克里福德显得“生机勃勃”（126）。在得知康妮出轨的事情后，他恼怒万分，但又显得可怜无助。“他用双臂搂着她<sup>1</sup>，像个孩子似的偎依着她”（355）。“他会把手放在她的怀里，抚摩她的乳房，并在那儿狂乱欣喜地亲吻，他已经成人，却还自以为是个孩子，这是一种反常的欣喜”（356）。他残缺的身体特征使他就像一个摇篮中的婴儿，没有自己行动的能力，只能仰仗别人的帮助。在克里福德无意识中，波尔顿太太兼具母亲和情人两种角色，成为了他的欲望对象。因此，他们之间的爱触犯了无意识中的欲望禁忌。发生这样的事情纯粹是康妮的移情别恋造成的。克里福德在康妮身上得不到爱情关怀，只能在波尔顿太太那里寻求爱的温暖。对他来说，爱人这一漂浮的能指已经悄然指涉到了波尔顿太太。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一文中，劳伦斯这样评价克里福德：“克里福德是个纯粹的个性之人，与他的同胞男女全然断了联系，只同有用的人还有联系。他身上热情全无，壁炉全凉了，心已非人心。他纯粹是我们文明的产物，但也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他善良的时候也不失刻板，他根本不知热情与同情为何物。他就是他，最终失去了他的好女人”（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355）。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克里福德并非冷酷无情，也并非没有亲朋好友。而劳伦斯所谓的“好女人”康妮也只是在婚姻存续的初期对克里福德报有一丝的爱意，但随着克里福德身体残疾，失去性功能，康妮就开始对他冷眼相待，并且在家里与昔日的情人幽会，与猎场守护员梅勒斯更是长时间的疯狂做爱。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法律层面来讲，康妮这些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风流韵事，都背叛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她根本不是一个“好女人”。正如劳伦斯本人所言：“思与行、说与做是两回事，我们过的就是一种分裂的生活”（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308）。这种生活在康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劳伦斯互相矛盾的说法其实也体现了他思想上的双重性。

### 自然选择与伦理选择

美国思想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说过，19世

1 这里指波尔顿太太。

纪存在这样一种焦虑，即人能够不是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人的关系（特里林 122）。其意思是，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脱离了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机械已经被充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之中，某些非人的力量不仅占据了物理空间，更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他希望有一些暴力性的东西来警醒人类，以便将人类的精神从默然的非生存状态中拯救出来。他特别赞许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中库尔兹的临终“壮举”，认为正是这种勇于作为的可怕之举让库尔兹有权断言生活的真实性。在《查》中，康妮似乎也有类似的“壮举”：她通过与猎场守护人梅勒斯的情感纠葛，冲破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藩篱，从而为僵化、麻木的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气息。然而，我们在为康妮的“勇敢”行为表示惊叹之余，如果再进一步深思的话，就会发现，康妮的行为有点矫枉过正了，她只顾张扬自己的自然特性，而忽视了社会伦理的存在。聂珍钊指出，人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就是伦理意识。<sup>1</sup> 康妮为了自然选择而抛弃了伦理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降格为物了。

在婚姻的激情期过后，康妮逐渐感受到了无性婚姻给自己带来的情感上的寂寞和虚无。“他们的婚姻，克里福德谈到的那种基于亲密习惯的完备生活，有些日子竟全都成了彻底的空白和纯粹的虚无。这只是些言辞，只不过是这么多的言辞。唯一的真实就是虚无，在其之上是伪善的言辞”（55）。劳伦斯也在小说中为康妮感慨道：“虚无啊！接受这生命的虚无似乎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所有那许多繁忙而重要的小事，共同组成了这巨大的虚无！”（61）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所言，虚无是世界上最柔弱，同时也最无法突破的东西，欲望最终只是为了虚无（伊格尔顿 100）。由于精神上强烈的虚无感和生理上的欲望，使康妮愈发注意自己的身体：“她脱光了衣服，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79）。她感到自己身体原本应该“稳健的、奔流的曲线”现在却变得“平板、粗糙”（79）了，“失去了光泽和活力”（80）。康妮的内心深处，逐渐产生一种不公和受骗的感觉，肉体的不公感也随之被唤醒。她对克里福德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和蔑视，同时也对自己是否坚守传统的伦理身份产生了动摇。

其实，克里福德和康妮之间并不是在克里福德瘫痪之后才停止了性行为，在此之前就很少过夫妻生活。所以，康妮的出轨不应该全部归咎于克里福德的残疾。二人的差别在于：首先，克里福德有点性冷淡，而康妮则性欲旺盛，在结婚之前她就频频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如果说做爱是动物的自然行为的话，很多动物特别是雌性动物只有在发情期才要交配的，其交配的目的就是繁衍下一代，而非为了激情和性欲的满足。其次，克里福德整天忙于管理自己的矿山，还要画画，而康妮只是一个阔太太，整天无所事事，没有正当的职业，丈夫又缺少陪伴。在康妮看来，“爱情、快乐、幸福、家、母亲、父亲、丈夫，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 页。

所有这些伟大的、充满活力的词汇，现在都奄奄一息，一天天地走向死亡”（6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机会，她极易移情别恋，红杏出墙。她与梅勒斯最初纯粹是性力的作用才走到了一起。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语言是没有被满足的欲望的残留物，也是欲望的另类表达，欲望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满足。语言在意指上无可避免的失败，是对母亲欲望禁制的必然结果；这个禁制奠定了语言的可能性，同时也标志了语言指涉之举的虚妄性（Balbert 58-9）。“爱情、快乐、幸福、家、母亲、父亲、丈夫”等这些能指词汇对应的所指对于康妮而言已经改变了意义。我们知道，虽然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他是把这个任意的关系放在一个必须是完整的语言体系里来理解的。所有语言的词语都必须基于语言结构的整体性这一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语要产生意义，就必须预设这个整体，并隐含对它的召唤，离开了这个整体，词语也就失去了意义（Balbert 54）。在康妮看来，克里福德实际上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男人，他们之间的生理性别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生理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承载这些词汇意义的社会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伦理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她也就无需恪守妻子的伦理责任了。

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指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她是在社会中才成为女人的。<sup>1</sup> 这表明了女人与社会间的关系，指出了社会对女人身份的规定性和女人身体的社会属性。同样，纯粹的天然性身体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身体”是“社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引用自己的结果”（倪湛舸 5）。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在性别问题上指出，只有当生理性别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与社会性别以及欲望有必然关系的时候，性别才能指涉某种有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的整体经验（巴特勒 31）。这里的社会性别是指对自我的一种心理或文化上的规定性，也就是满足社会对性别的规定，强调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伦理选择。在《查》中，克里福德把康妮看作是“阿喀琉斯的脚后跟”，“能给他致命的一击”（127）。为了维系与康妮的关系，他甚至主张她可以和别的男人生孩子，但条件是要姓查泰莱家族的姓。这种要求在当时是无可厚非，而且也是符合当时社会伦理秩序的。因为查泰莱家族为了国家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克里福德的父亲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让克里福德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这个虚妄的存在就像语言学概念中穿梭的能指，对应着一个个的所指，同时也反映着不同人物的主体间性。在克里福德没有丧失性功能的时候，康妮盼望和他有个孩子，以防她的小姑子爱玛来分他们的家产。在克里福德丧失性功能之后，康妮的父亲反复游说克里福德和康妮，让康妮借精生子，以保持和克里福德的婚姻关系。他告诉克里福德，为了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康妮必须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告诫康妮：“如果你要把关系撕破，

1 参见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09 页。

你是得不到多大好处的。（……）给拉格比生个小男爵吧：这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332）。康妮父亲的劝导虽显自私，但也体现了父亲对女儿的关心以及孩子对婚姻的重要性。但康妮和梅勒斯做爱怀孕后，却要和克里福德离婚。这给了查泰莱家族“一记大耳光”（171）。康妮的这种虚伪和自私的行为其实体现出劳伦斯的双重性。他既要赞美康妮的叛逆行为，同时也暴露出她自私虚伪的性格特征，无意识地隐现了康妮真实界的面庞。在见到梅勒斯之前，康妮对克里福德的谦和感到“恐惧”，认为他那种“崇拜的宣言”是“一种完全无能的残忍”（130）。她觉得“她快疯了，要不就是她快要死了”（130）。从此可以看出，康妮已经不满足于表面的尊重和谦和，她的生理欲望已经让她无法忍受这种无性的婚姻生活。性欲望挑战着康妮之前自己能管控自己的认知，推翻了理想的、有意识的自我。批评家琳达·露丝（Linda Ruth）指出，性是自我的非理性力量，它强化了对自我的对立面，使真正的自我从可意识到的自我中分离出来（Ruth 16）。康妮的自我是不连贯的、自我否定的，而且还是互相矛盾的。她无意识中充溢着不安分的冲动，她后来与梅勒斯的性行为实际上标志着她对理性的完美主体的弃绝。反人文主义者认为，主体是受欲望和未知的力量所支配的，永远不可能完全是理性和自我控制的，而是受无意识欲望驱动，无意识控制主体而不是被主体控制。劳伦斯把无意识的“生命”作为决定行为的推动力，他所谓的无意识不是缺乏意识，而是有着强烈生物意味的“血性意识”，也就是对生物本性的呼唤，鼓励人们去追求自然选择，摒弃伦理选择。

相较于克里福德和康妮，梅勒斯算是小说中的三号人物。他和克里福德一样，也是一位上过战场的老兵，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77），有过失败的婚姻，受过高等教育，既会说德比郡的土话，也会说标准的英语。除此之外，小说没有过多披露梅勒斯的过去。作为克里福德家的猎场守护员，他过着一种田园式的闲适生活，住着小木屋，饲养着家禽，用着当兵时的毛毯和水壶。康妮的闯入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不过，与康妮相比，他始终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和康妮疯狂做爱，这对于他来讲，也只是一时贪欢而已。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因此，在做爱之后，他最希望的就是她能离开，让他一个人待在孤寂中。“他畏惧的是她冷酷的、上层阶级女性的轻率的自行其是，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佣人，他厌恶她出现在这里”（103）。他提醒康妮：“你是查泰莱夫人，你在跟一个猎场守护人发生暧昧关系。如果我是一位绅士，事情就另当别论。是的，你会在意的，你不能不顾虑”（145）。梅勒斯的话语透露出，他明白康妮找他只是上层阶级女性一时性起的轻率行为，他只是满足她欲望的性工具而已，而且她会在意他们间的阶级差别的。所以，梅勒斯担心他们间的关系不会维持长久，而且也会给克里福德带来巨大的伤害。作者貌似不经意地透露出梅勒斯的年龄，实则含有深意。他比康妮大了十几岁，这意味着他们间存在着代沟，也意味着他们

间存在着乱伦禁忌。梅勒斯离开克里福德的狩猎场回到乡间，在农场找了份工作。他的想法是无论康妮是否能离婚，他都会和妻子离婚的。这表明，他离婚并不全是因为康妮，他对康妮是否离婚抱着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从法律层面讲，如果他们双方不离婚就结婚的话，就会犯重婚罪。这些都表明了梅勒斯性格上的成熟和稳重。在他们的交往中，康妮始终保持着主动，她只是在意自己的生理性别，很少去考虑自己的社会性别，也就是自己的社会伦理责任。克里福德对康妮的评价尽管有些刻薄但也准确：“你跟人不一样，你不合常规，你是那种半疯不傻，不正经的女人，成天追逐着堕落，对污秽之物念念不忘”（363）。

女性学者皮特·保尔波特（Peter Balbert）评价说，在性爱过程中，作者详细描写了梅勒斯的主动行为，体现了作者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她们控诉这些男性具有“男性至上的投机主义和冷淡的操纵欲望”（Balbert 146）。李维屏指出，梅勒斯这一人物形象不仅表明了作者对自然人性和原始再生力量的充分肯定，而且还使作者在人物画廊中树立了一个足以能够与以克里福德为代表的摧残人性、扼杀生机的邪恶势力抗衡的形象。所以梅勒斯是现代工业制度下迫切回归自然的“文明人”的化身（李维屏 283）。通过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些评价只是看到了小说的显性层面，而忽视了其蕴含的深层意蕴，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双重性，忽视了作者思想上的双重性。劳伦斯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一文中写道：“我要让男人和女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想性的事。即使我们不能尽情地享受性，但我们至少要有完整而纯净的性观念”（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308）。劳伦斯在这里似乎在为性开放摇旗呐喊，在为自己与老师的妻子私奔一事开脱，但实际上劳伦斯是在强调性开放的前提条件，即要有“完整而纯净的性观念”。这里的纯净指的是摒弃虚伪、自私等消极因素。但他又消极地指出，“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人与人之间如此不信任”（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319）。他认为，“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不是铁板一块，并非完全虚伪也并非完全爱的真切”（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321）。我们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劳伦斯也认识到人的双重性和复杂性，他所赞美的“完整而纯净的性观念”是不存在的。他还说过：“现代生活中十有八九的不幸是婚姻的不幸。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没有几个不强烈地仇视婚姻本身的，因为婚姻成了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一种制度”（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331）。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却给康妮和梅勒斯安排了婚姻的美好前景。《查》描述了无性婚姻的破裂和基于欲望的两性关系的发展。不过，在小说结尾，康妮并没有嫁给梅勒斯，尽管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且他们对未来的家庭充满了向往，但最后还是分开了，只能靠写信维系关系，好像他们间的关系也只有靠信件存在了。但对于劳伦斯本人来讲，他倒是在和有夫之妇私奔后结婚了。他虽然极力反对婚

姻，但也是婚姻的践行者。评论家皮特·斯琪可奈（Peter Scheckner）指出，“性激情与守护人的社会意识间存在着矛盾。即使作者意图用心理、宗教或性来掩饰阶级和社会问题，但这些社会和性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被妥善解决”（Scheckner 13）。这里的矛盾其实指的是社会伦理秩序对性的伦理约束与个人性压抑间的矛盾。劳伦斯的世界观时常受到一战、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一战前后不时发生的工人罢工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困扰他的不是性也不是心理，而是社会。他在信中写道：“比起性本能来说，我考虑更多的是社会本能，社会压抑更具破坏性”（Lawrence,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990）。性本能突出主体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本能则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别，即遵守社会伦理秩序的本能。伊格尔顿指出：“理性越是与其身体相脱离，身体就越碎裂成纯感官的无意义碎片”（伊格尔顿 111）。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在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约束下形成的对伦理身份的认知。主体可以自由支配的身体一旦脱离理性约束的藩篱，就会变成纯粹生理性别意义上的动物，其社会性别也就消失殆尽了。这样看来，劳伦斯的思想里深藏着一种伦理悖论：他既要号召人们打破婚姻，甚至法律和伦理的禁锢，追求一种纯净的、无拘无束的性爱，同时又给予主体回归婚姻的期盼。这也充分暴露了劳伦斯思想上的双重性。

### 结语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在人类活动的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不断得到发展，人必须利用理性和知识来发展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情感，使人的社会本能和爱人之心不断增强，使个人情感、利己本能服从于社会情感和爱人本能，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自觉地服从于社会道德。<sup>1</sup>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指出，道德主体是个体的自我，自由的道德主体具有多种存在特性和存在结构，认识这些主体存在的特性和结构，是理解人的伦理意义、行动和关系的密码（万俊人 23）。在《查》中，劳伦斯试图以性的方式来激活人们麻木、异化的心灵，鼓励人们重返自然乐园，但这种伊甸园式的生存状态全然忽视了社会伦理秩序和伦理身份。不过，劳伦斯在叙述过程中，也隐隐暗示出性的欲望与人的社会本能间的冲突。人的社会本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遵守社会伦理秩序。性爱如果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严肃和认真，也必然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害。人非动物，性爱不可能超脱一切。康妮个人欲望的表达也需限制在一定的伦理秩序之内，否则人类赖以存在的社会文明就会分崩离析。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栖身之所，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健康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才能保证人的健康发展。

1 参见 冯俊：《当代法国伦理思想》，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

## Works Cited

- Balbert, Peter. *D. H. Lawrence and the Phallic Imag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 巴特勒, 朱迪斯: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宋素凤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Trans. Song Sufeng.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波伏娃, 西蒙娜·德: 《第二性》, 陶铁柱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
-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Trans. Tao Tiezhu. Beijing: Chinese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冯俊: 《当代法国伦理思想》。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Feng Jun. *The Contemporary Ethics of France*. Shanghai: Tongji UP, 2007.]
- Lawrence, D. H.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 .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Ed. Harry T. Moore. New York: Viking, 1962.
- D. H. 劳伦斯: “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奥维德·劳伦斯论性爱》, 戴望舒、黑马译。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6 年, 第 303-359 页。
- [Lawrence, D. H. “A debate o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rans. Dai Wangshu, Hei Ma. *Ovidius, D. H. Lawrence. The Art of Love, on Eros*.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06: 303-359.]
-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杨恒达译。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 年。
- [——.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rans. Yang Hengda.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李宝芳: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 [Li Baofang. *A Stud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Middle Class of British Victorian Period*.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5.]
- 李维屏: 《英国小说人物史》。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8 年。
- [Li Weiping. *The History of Characters in English Novel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 倪湛舸: “语言·主体·性别——初探巴特勒的知识迷宫”,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朱迪斯·巴特勒著, 宋素凤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 [Ni Zhange. “Language, Subject and Gender: on Butler's Knowledge Puzzle.” Judith Butler. Trans. Song Sufeng.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2.]
- Ruth, Linda. *D. H. Lawrence*.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1997.

Scheckner, Peter. *Class, Politics, and the Individual: A Study of the Major Works of D. H. Lawrence*.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特里林, 莱昂内尔: 《诚与真》, 刘佳林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Trilling, Lionel.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Trans. Liu Jialin.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6.]

万俊人: 《萨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Wan Junren. *A Study of Sartre's Ethics*. Beijing: Beijing UP, 1988.]

Williams, Raymond. "Woman in Domestic Life." *Magazine of Domestic Economy* 1(1836): 62-73.

张中载: 《二十世纪英国文学: 小说研究》。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Zhang Zhongzai. *British Literature in Twentieth Century*. Kaifeng: Henan UP, 2001.]